

# 印刷文化视野下的胡兰成文化理念的践行与失败： 以台湾“三三集刊”创作生活为中心的考察

## The Patrice and Failure of Hu Lancheng'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t Culture: The Creative Life of *The Threes Journal*

金 进 (Jin Jin)

**内容摘要：**1974年5月，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聘来台任教，1976年11月8日被逼离开台湾。1977年4月20日（三月初三）“三三”成立，胡兰成以通信方式鼓励朱天文创办刊物，朱天文、仙枝等人共同主编三三集刊，1978年10月，胡兰成以“李磐”为名，自三三集刊十五辑（《日出西山雨》）起，开始为三三撰稿。1981年胡兰成逝世，《三三集刊》随即停办。从三三集刊入手，研究胡兰成文化理念的实践过程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本文将从胡兰成的文化理念内容的内涵以及“三三集刊”所受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入手，分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胡兰成的学说失败的原因，从而试图对胡兰成和三三集刊的文学史地位进行新的评价和定位。

**关键词：**胡兰成；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中国；三三集刊

**作者简介：**金进，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导，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东南亚华人文学。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项目号18BZW154】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Patrice and Failure of Hu Lancheng'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t Culture: The Creative Life of *The Threes Journal*

**Abstract:** In May 1974, Hu Lancheng was invited to teach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n Taiwan. On 8 November 1976, he was forced to leave. Encouraged by Hu, Zhu Tianwen together with Xianzhi founded The Threes Literary Society on 20 April 1977 and started publishing *The Threes Journal*. Starting from October 1978, Hu under the penname Li Pan began contributing to the journal. With the death of Hu's death in 1981, *The Threes Journal* has also come to an end as well. I believe that it is a novel perspective to examine Hu's thought and his cultural practice by using the journal as a point of entry.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ailure of Hu's doctrines by looking at how his cultural ideas had influenced the *The Threes*. By doing so, I intend to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Hu and *The Threes Journal*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Hu Lancheng; cultural conservatism, cultural China, *The Threes Journal*

**Author:** **Jin Jin**,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specializing in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Singaporean-Malaysian literature (Email: chsjj@zju.edu.cn).

1974年5月,胡兰成入境台湾,应中国文化大学之聘来台任教,同年秋,开始教授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禅宗思想和“华学、科学与哲学”数门课程。在华冈遇到林慧娥(后易名仙枝,时为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其从暑假起就为胡兰成誊抄文件。1974年8月和1975年9月,朱天文两度随父亲朱西宁上华冈拜访胡兰成,其间曾重读胡兰成《今生今世》。1976年4月底,胡兰成因抗战汉奸之名被揭发,10月被迫停课,《今生今世》《山河岁月》被禁。随后由朱西宁安排避居景美朱家隔壁,此后胡兰成成为朱家姊妹及其文友讲经论道,在日常生活里随处点拨。因颜元叔、余光中等学者的驱胡行为,胡兰成终于1976年11月8日被逼离开台湾。1977年4月20日(三月初三)“三三”成立,在胡兰成的通信鼓励下,朱天文、仙枝等人共同主编三三集刊。1978年10月,胡兰成以“李磐”为名,自三三集刊十五辑(《日出西山雨》)起,开始为三三撰稿。1981年胡兰成逝世,同年8月,《三三集刊》停办。1989年三三书坊停止运作。名噪一时的“三三集刊”本身包括“三三集刊”二十八册和“三三书坊”十二册,其中“三三书坊”中有胡兰成化名“李磐”所作的《禅是一枝花》(1979)、《中国礼乐》(1979)、《中国文学史话》(1980)和《今日何日兮》(1981)。

朱天文曾经这样回溯自己的前期创作,“当时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我。〔……〕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的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复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朱天文 311)。这段时间正好与胡兰成与朱家结识、旅居台湾及被迫逃到日本,直至1981年去世的时间重合。可以说,从“三三集刊”的研究入手,进而研究胡兰成文化理念的影响和实践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本文将从胡兰成的文化理念内涵以及“三三集刊”所受其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入手,分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文学场域下,胡兰成的学说失败的原因,从而试图对胡兰成和三三集刊的文学史地位进行新的评价和定位。

### 一、胡兰成的文化理念中的保守主义和教化意图

何谓“三三”?三三集刊扉页上所写:

“你若认为‘三三’纵排出乾卦，横排出坤卦，也好。你若认为‘三三’向往中国文学传统的‘兴比赋’，也好。你若认为‘三三’想要三达德，也好。或者你若认为‘三三’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故事，也好。你若认为‘三三’说的‘三位一体’真神的故事，也好。你若认为‘三三’说的‘三民主义’真理的故事，也好。也许你若认为‘三三’就只是那样一个‘三三’，也好。”

“三三”即尊崇三民主义与三位一体，前者为孙文学说，后者为基督教义。三三集刊本欲取名“江河”，可见其中浓烈的中国意识。三三的精神领袖就是胡兰成，朱西宁则是背后的支持者。台湾学者庄宜文归纳胡兰成的文化信念，一是“复兴中华文化”，二是“遵行三民主义”，三是“批驳乡土文学”，四是“完成伐共建国”（庄宜文 144-46）。但我认为，这份宣言糅杂着文化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的政治/文化信仰，三三成员一开始就陷入到一个庞杂的文化理想图景中，而文学创作是一种语言和情感结合的艺术，这些矛盾都为胡兰成文化理念的失败埋下了导火线。

胡兰成为什么能成为三三群士的精神领袖？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首先跟败退台湾之后的国民党教育政策有关。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地区，因为战时环境的限制，在文化方面的建树不多，很多文化机构都是以“临时”的形式形成的。加上对中共文艺政策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忌惮和敌意，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都采取禁绝态度，所以文学传统相当的支离破碎。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薄弱，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迅速遁入‘大中华中心主义’修辞和带有新传统主义色彩的道德主义之中。比如，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宣扬的阶级仇恨，国民党的右翼理论家鼓吹‘人性’或儒家思想中的性善主张，然而‘人性’很快就沦为文化官僚口中的教诲性修辞。此外，怂恿知识分子回避赤裸裸的社会经济问题，把有关‘阶级’的讨论列为禁忌。诸如此类的消极策略，多年后终于引发了20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运动那样的强烈反扑。而与此同时，接受国民党‘教诲式’意识形态灌输的知识分子则发展出一套保守的文化主义观点，广泛地为占据主流文学位置的文化参与者所信从。”（张诵圣 57）

虽然胡兰成的学说被余光中等人认为是一种反理性的、乌托邦式的文化

保守主义，<sup>1</sup>但因为 20 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坛右翼化的“文化民族主义”或者“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胡兰成的《山河岁月》（1975）中对前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梳理正当其道，也因此用这种对前现代中国乌托邦式的召唤吸引了国民党“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培养的三三群士，其反共言论是非常明显的。第二点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毋庸置疑地说，胡兰成一直在利用自己张爱玲前夫的身份消费张爱玲，再加上朱西宁父女的崇拜心态和努力实践，也加强着他对三三群士的影响力。

早在抗战时期，胡兰成就认为“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确比东方在同时代的成就更多。但东方文明在已往一切时代中的成就，这样蓄积而成的传统，却是大于西方文明的传统，也就是所谓民族的本来面目”（胡兰成 176），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三三集刊中有一组连载了十四辑“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的集体讨论，这些标榜“集体讨论”的文章，都是对胡兰成理论的阐发。如第 7 辑的《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感激大自然》，文章讨论的是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中“古来中国文学的传统，第一是感激大自然”这一观点，文中把胡兰成化名为“早升旭”这个人物，借这个人物之口来解释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的传统，认为“至于西洋文学呢，就低俗在他们有人事而没有天意”（第 7 辑 226-27）。之后，三三群士，分别化名为“红玉”、“花皮五爪”、“喇叭三号”探讨“人事”与“天意”，不过结果是“众人纷纷云云，勉强得了一个结论，说天意是包含了人事与神意，而神意就是神意，与人事无关。但这也说到其大小的问题，与神意与天意的根本不同仍旧口齿不清。一伙人便僵在那里”（第 7 辑 第 229 页）。这篇讨论文章也暴露出胡兰成学说的漏洞。后续的《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人世的妙相》（第 8 辑）、《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喜反与好玩》（第 9 辑）、《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国文学的作者》（第 10 辑）、《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文学与历史的气运》（第 11 辑）。这些讨论文章所涉及的文化（文学）观点凸显出胡兰成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首先是反五四新文化立场。胡兰成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北京大学一派疑古的新风气，但是尧典里所讲的星象位置，竟在天文学上得到了证实”（第 11 辑 232-33）。第 14 辑《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知性的文学》也是出自胡兰成的文章，其中对五四新文学不断进行攻击和否定。更有甚者，他曾这样否定五四运动的价值：

1 余光中说：“胡兰成对于中国历史，一往情深，对于中国文化，则是绝对信任。可惜《山河岁月》的严重缺陷，也因此而来。胡兰成对于中国文化，只有肯定，绝少检讨。直接间接，他认定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至上美满，冠于世界，相形之下，夷狄的文明总有所不足。这种感觉，当做一种爱国情绪来欣赏，也许是动人的，可是当做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认。”参见余光中：“山河岁月话渔樵——评胡兰成新出的旧书”，《青青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 年）261。

“五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革命，若非这革命，不会有今天的许多好文章。但是五四犯了三个错误：一否定礼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把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是把文学看小了，其原因见于前几期的讨论文。这里只说礼教这种东西，就有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门一步，但是五四把礼教给否定了，这又是使人的情义漂失了。礼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换朝代，顶多也只是改了正朔与服色，没有改到祭祀与宾主伦常间之礼的。礼仪是中国人情意表现的形式，五四在原则上把礼教打倒了，至少在文学上写中国人的情意没有了形式，以致小说里用了西洋人的情意与动作的形式来描写中国人，这样，文学先就不美了，”（第12辑248）

其次是反共立场。第12辑《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文学与时代的运气——三三集刊作者讨论会》这篇一看就知道是胡兰成的文章，与第11辑一样，出自胡兰成的同一篇论文。在中国大陆版本中，最后一段删掉了：“中国今日之处境，犹甚于五胡乱华，而国父的革命已迈七十个年头，中国的前途将往何所？世界的前景又将如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竟会是一句空话吗？”（第12辑245）在这一段中，一句“五胡乱华变奏局”，就隐藏着浓厚的反共意识。

最后，胡兰成学说有着明显的“文化中国”教化意图。从第15辑《音乐论——声的究极》开始，一直到第24辑，胡兰成直接化名“李磐”来现身说法。他直接指出：

“三三会写文章的年轻人今知读中国的古书与国父全集，这是使创作的前途可以日月长新花生。〔……〕学唱是或昆曲，或平剧，或古乐的颂歌，都可，也必定要练习出正音来。曲调是秦汉至清的郊庙颂乐，与大雅小雅的谱调，以及自孔子的幽兰操以来的琴曲、宋词元曲等谱调，与汉魏六朝以来的童谣民歌的唱法与舞姿都讲究练习，必定要唱出舞出一个江山风景、英雄胸襟与万民之情来。”（第24辑44）

就胡兰成对三三诸子的影响来看，三三合唱团的建立必然与之有相当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三三群士之外，三三集刊有一支“文化中国”的外援文学部队。诗人郑愁予就是一例，“《衣钵》系列组诗”（第11辑124-40），由《仰望》、《芥子》、《热血》、《背影》和《衣钵》等5首诗歌组成，其旨在悼念孙中山先生，其中《背影》的最后一段：“两万人提灯为一个老壮士照路 / 带着最后生日的感慨 您将远行 / 在深灰的大氅里 裹着一腔什么 / 啊 / 那是革命的衣钵 历史已预知 / 当夕阳 浮雕您底背影在临江的黄

埔 / 那时正是您满意的诀别 / 因为 第二代的同志已长成”，联系前后文，这其中的“第二代的同志”指的是外省第一代，而《衣钵》最后一段中的“第三代”指的就是三三诸子，但其中的反共思维是相当明显的。第12辑重刊了郑愁予的《仁者无敌》，“(诗歌)分六节，“慈母”“祖国”“负重”“功成”“致远”和“誓言”，其中的内容相当空洞，不过也可以从反面看出蒋介石在台湾的无作为。

整首诗中一味赞美蒋介石的“仁”，可是稍懂历史的人，就知道蒋介石的一系列罪行，“宁汉合流”后的反革命大屠杀（1928）、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抗日（1937-1945）、“解放战争”中挑起的国共内战（1945-1949），这些似乎都被当代台湾主流知识分子遗忘了，有的只是被洗脑之后的“讴歌”。<sup>1</sup> 这些对“中华民国”的悲情回溯，故意营造的没落朝代的遗民身份，这些都契合着20世纪七十年代海外方兴未艾的文化中国思潮，支撑着胡兰成所倡导的文化中国理念。

## 二、三三群士<sup>2</sup>与“张腔”“胡说”<sup>3</sup>及他们所受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整体创作特色来定位的话，三三群士的创作属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校园青春文学范畴。三三群士都是眷村子弟，这些眷村子弟多有军中背景，这些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相对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人，形成了台湾独特的眷村次文化的骨干，他们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坛地位惠及外省第二代作家，培养了以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为首的三三群士。无论从创作内容还是艺术实践，再加上他们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归属，其作品中的校园文学气息是相当浓厚的。“促使早期‘三三社’成员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以

1 《台湾省戒严令》（正式名称：《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是一个于1949年5月19日由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的戒严令，内容为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含台湾本岛、澎湖群岛及其它附属岛屿）实施戒严，从戒严令颁布直到1949年底，中华民国政府相关单位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关管制法令。至1987年7月15日由蒋经国总统宣布解严为止，共持续了38年又56天之久，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戒严。

2 “三三群士”是当时台湾文化界对三三集刊作者群的称呼。原文是“自从书坊出了‘中国站起’，文化界的先辈们便开始唤三三的朋友们是‘三三群士’，这让三三的朋友们又愧疚又惊惶。”参见仙枝：“三三小根苗”，《三三集刊》第25辑（台北：皇冠出版社，1979年）132。

3 这两个词都是王德威教授发明的，前者原文为“小说界也有张腔，肇始者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参见王德威：“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第337-41页。后者原文“彼时的朱天文还太‘正经’；要再等十年，她才终于把‘张腔’与‘胡说’熔为一炉，从而炼出自己的风格”，参见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251。

华丽的身姿所展示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年轻气盛的理想主义”（张诵圣 130）。这种青春理想主义式的校园文学的表现方式是一种文化中国视野下的文学创作。这些年轻作家，他们都没有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小说中的中国并非当时的中国现实，有的是大学校园中的学习生活，有的是诗歌中用文本建构起来的文化幻影，有的是军中文艺的颠倒历史的战斗。可以说他们将胡兰成学说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用记忆和虚构对“文化中国”进行阐释。三三群士与他们的偶像张爱玲相较而言：

“张爱玲那时代的人们比现在的人们多有接触时势的感觉，也比较会独立的思考事情，也比较多读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朱天文的一代年轻人，则惟是趋时尚，而于时势无感觉，很少会独立思想，很少读功课作业外的书，受美国式教育的影响，体格成人了，精神多未成人，每是成人的駸竖。青年作家因为见识不及，根底不够，多像草生一秋即萎。这点我与朱天文谈起，她倒是肯重新用功读书。知道今是颓废的时代，即你是可以不受一个时代的限制，而生于许多时代中，生出革命的朝气的。”（胡兰成 268）

从整体风格而言，三三群士的创作是对“张腔”“胡说”的继承和发挥。首先是胡兰成文化理论对三三群士创作的统摄。“胡派学说讲的是天人革命，诗礼中国；儒释兼备，却又透露妩媚娇娆之气。有趣的是，尽管胡兰成写得天花乱坠，总有个呼之欲出的张爱玲权充他的缪斯。‘三三’诸子中，兼修张、胡两家而出类拔萃者，当然是朱天文”（仙枝 1979）。胡兰成说朱天文与张爱玲不但都是大学三年级，“两人相像的地方是一个新字，一个柔字，又一个大字。而且两人都谦虚，张爱玲肯称赞苏青的文章与相貌，朱天文亦看同辈的作品〔……〕。还有在事物上的笨拙相像。两人的相貌神情也有几分相似，文章也有几分相近”（胡兰成 283）。另外，也提到仙枝这一笔名，也是胡兰成为她取自苏轼的名句“别有红尘外，仙枝日月长”（王德威 251）。这些给朱天文、朱天心、仙枝众弟子巨大的压力，一直以张爱玲为模仿甚至超越的对象。1995年，朱天文以《荒人手记》获得华语文坛一致赞赏，在接受访问时候，她说自己十年不读张爱玲，以前总觉得她是无法超越的偶像，“今天看看，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平了。也不是平，是总算可以不同了”（朱天文第7版）。可见在其创作生涯中，朱天文无意识中也在跟张爱玲较劲。胡兰成的专著中对“三三诸人”影响最深的是《中国文学史话》。仙枝曾经撰文道：“自民初五四以来于今六十年，文坛皆是据西洋文学来评论中国文学，有多少傲慢无知，彼此斗争，如禅语脚下草深数丈，骷髅遍地无人知。今李先生此书也不与人争，而只让中国文学自己出来说话，就自然都澄清了。读此书

使人觉得自己亦要对天地是智者，对中国是情人。文章是智者之言，而亦是情人之言”（仙枝 5）。

而最能直接表达李磐（胡兰成）与“三三诸人”关系的是十年后朱天文之言：“以上是胡先生于民国六十六年夏天于侨居地日本写完的《中国文学史话》。因胡先生在台湾授课的学生中多有青年写作者，故著此作励教激志，且援彼等青年的作品为例多做说明，其背景如此”（朱天文 2）。在这本著作中，不到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话》中，对仙枝、朱天文、朱天心和袁琼琼的评价竟共有八十多处，如此提携未成名的作家少作，胡兰成的护犊之心可见一斑。不过联系胡兰成当时落水狗般的生活际遇，我更愿意把他的提携行为看作心中文学理想的印证与实现。以朱天心为例，她连载于“三三集刊”的《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被胡兰成盛赞“那好处是有唐虞三代传下来的高旷清亮强大。现在是朱天心的《击壤歌》有这个”（胡兰成 95）；“《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与朱天文《青青子衿》里的对世人世事与物的无差别的善意，就是文学的绝对的境地”（胡兰成 145），赞誉之辞溢于笔端。

### 三、胡兰成文化理念失败的内外原因分析

从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进入了世界上历时最长的戒严时期，直至 1987 年解严。而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更是台湾史上风起云涌的时期，随着蒋介石的去世（1975）、中美建交（1979）、美丽岛事件（1979），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正处于剧变和松动之中，毕竟“从时序上划分段落，或许可以从一九六九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因为他标志着‘蒋经国时代’不可避免的终将到来；至于它的结束，则毫无疑问的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中’美断交。十年台湾，十年坎坷，而我们以及我们的今天都是从这里长大的”（杨泽 118）。长期以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三三群士被其他台湾作家视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文学群体。朱天心回忆起被认为“御用文人”或“国民党”的打手，至今仍觉委屈。同为三三群士成员的谢材俊说：“乡土论战，我和朋友从纯文学这边很奇怪的变成纯国民党的这一边，至今清白难复——谁晓得在漏洞百出的文学意见和天真浪漫的作品背后，藏着那么大的政治、民族觉醒加权力意识呢？”（谢材俊 131）从所刊发的文章而言，三三集刊中大量的刊登军中文艺作品，确实有迎合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嫌疑。如第 8、9 辑连载的《剑门》（1978）就是典型的军中文艺作品，曾经获得第十三届国军文艺金像奖中篇小说银像奖。第一段就把矛头直指海峡两岸的军

事对峙，涉及到两岸对抗时期的“剑门舰事件”。<sup>1</sup>如果熟悉台海历史的话，这部小说所描述的故事完全是造假，它设置了“剑门舰”没有被击沉，而是由“镇南舰”营救成功的虚构结局。小说结尾部分：

“〔……〕国军已向内陆推进了。七天来，我们势如破竹，与大陆内部反共力量节节呼应。海军除了已掌握了制海权，更进而封锁了大陆沿岸及长江口——永彬，你们是首功，恐怕你们都不知道自己扮演了多重重要的角色。你们单舰欺敌行动把敌主力诱散，我们各个击破，奇袭作战顺利的成功了——迅雷演习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反攻登陆实兵行动。”（马叔礼第9辑156）

这一段中的所谓“单舰欺敌”、“掌握了制海权”等等说法，足见这是一篇罔顾历史事实的订制之作，让人感觉到文学被极端政治化之后的造作与恶心。第10辑陈万军《种火行动》（1978）是“国军金鹰奖中篇小说金鹰作”，故事内容满含着冷战政治。

这类作品还有第11、12辑连载的汪洋《春蚕到死》（1978），这篇反共小说肆意抹黑共产党抗日军民，在一些历史书写上不尊重史实，如为国民党对日投降政策开脱，“中央也有苦衷，不得不安抚他们，不然的话，两面作战，那是兵家大忌，他们是乘机全力扩张势力”，更过分的是，虚构抗日军民策应日军，帮日军解围的情节。这些作品中关于反共文学的描写让人感到其中浓厚的敌对情绪。

其次，朱西宁的对基督教教义的文学化理念和军中作家的文学身份对“三三群士”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也使得胡兰成的理论与朱西宁所推荐发表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分散了践行胡兰成文艺理论的作品篇幅和影响力。朱西宁一直到第13辑才公开自己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刊在这一辑中的孙文《致中国基督教青年书》，其中认为基督教能够让“今中国人民即由散沙而渐结团体，〔……〕诸君既置身于此高尚坚强宏大之团体，而适中国此时有倒悬待救之人民，岂不当发其宏愿，以此青年之团体而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乎？中国基督教青年勉旃！毋负国人之望”（第13辑227）。紧接着的第14辑指出

1 剑门舰事件：“剑门号”原系美国“海鸦”级舰队扫雷舰，由美国于1965年4月交给蒋介石集团。1965年8月5日，汕头水警区东山岛金刚山观通站雷达观测到台湾东营港84海里处，有“剑门舰”和“章江号”混在商船中，向我沿海地区袭来。当晚发生激战，8月6日凌晨“章江号”“剑门号”先后被击沉。此役历时3小时43分钟，击沉国民党猎潜舰2艘，击毙国民党海军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等170余人，生俘“剑门舰”舰长王蕴山等34人。“八六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对台湾国民党海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标志着国民党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军事优势已成为过去。

“三三”的真意：“西洋化教会的低文化，一向是，也断乎是不足凌驾中国的高文化。这也正是以三位一体真神为乐，为能力，以三民主义真理为体，为方向的‘三三’所抱持的大信”（第14辑22）。

加之朱西宁“军中三剑客”的身份，特别是一直发表军中文艺，其中很多对抗思维，不只是分掉了三三集刊的大量篇幅，同时也使得三三集刊蒙上了政治上归属国民党主流文学的色彩，如陈万军的《天之骄子》曾获得国军文艺金像奖长篇小说奖，他是三三集刊《种火行动》（第10辑）、《霹雳塔》（第14辑）的作者；履疆的《水势》曾获得长篇小说银像奖，他是三三集刊《阿晖先生及其他》（第1辑）、《雨夜》（第4辑）、《卜居》（第7辑）、《战士手记》（第11辑）、《惊艳》（第13辑）的作者；马蹄铁的中篇小说《生死场》曾获得长篇小说佳作奖，他是三三集刊《夜来风雨声》（第3辑）、《阿贵》（第8辑）的作者；程幻欢的《归航》曾获得短篇小说银像奖，他是《喜相逢》（第4辑）的作者，还有汪启疆的《给我们中国的儿女》曾获得短诗银像奖，他也是三三集刊第8、9辑连载的《剑门》的作者。如果说胡兰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民间文人的立场，那么朱西宁的身份就颇具官方文艺的本色，从三三集刊的内容来看，官方意识压倒民间话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

还有一点是，“三三”本身的青春校园文学对胡兰成文学理念的稀释。如朱天心的长篇连载《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讲述的是台北第一女子高中女生小虾的中学故事，同题材的还有蒋晓云的短篇连载小说的《宴》三部曲、谢材俊连载于第1-2辑的中篇小说《岭山雁字》（上、下）等等，都是校园文学的代表。另外，在《日出东南隅》（谢材俊）可见被服厂的眷村生活，《守着阳光守着你》（丁亚民）中回忆的是眷村童年生活，等等。这些情感真挚的现实生活书写，冲淡了胡兰成干巴巴的文化理论，形成了台湾文学历史上最具特色的青春文学团体。

总而言之，“三三时期”的结束，一方面是因其精神导师胡兰成远走日本，并在1981年7月去世。另一方面因是胡兰成的礼乐中国，以及三三集团梦想，与现实中的台湾相距太远。政治上的剧变，如1979年台美断交，随后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文化上的乡土文学的兴起、1975年校园民歌兴起、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这些现实社会处境，在在都冲击三三集团的生存。就这样，在剧变的新时代浪潮冲击下，三三群士曾经的文学理想，慢慢被推到历史的暗处。

### 结语

毋庸置疑，三三集刊的诞生和发展是胡兰成一手扶持的。王德威认为胡兰成在台湾与三三诸子的接触，

“在《三三集刊》这个社团里，一群青年男女就跟着胡老师吟哦礼乐、

遐想日月江山，想象有朝一日以王师之态回到中原，建立他们的礼乐中国。这个礼乐的江山最后到底也没有达成。没有，一切都没有。才不过几年的时光，这些当年的‘三三’少年都已经逐渐地成长，历尽台湾剧烈的转变，成为所谓的‘老灵魂’。胡兰成的礼乐方案，他的抒情大业，最后都要九九还原，划归到民间的、俗骨凡胎的流动痴嗔爱怨之中”。（王德威 198）

三三群士对台湾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如第 1 辑中，吴念真的《今夜西风冷》（1977）中一开篇就是老萧怀念河北老家，关于秋天落叶的描写，让人想起了十年后吴念真编剧的《暗恋桃花源》。在这一辑里，银正雄的《一座纯真的桥——评陈雨航的〈策马入林〉》（1977）中谈到的桃花源、武陵人，也启发了吴念真和朱天文的《暗恋桃花源》。再如，第 23 辑静圆中的《黄春明的〈小琪的那一顶帽子〉》（1977），黄春明的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侯孝贤的电影，而编剧也是三三群士中的吴念真。这些都为我们重新定位三三、胡兰成与台湾文坛的关系，从而为研究外省第一代（朱西宁）、外省第二代（朱天心、朱天文）两代人的创作姿态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 Works Cited

- 谢材俊：“昨日的雪而今何在？”，《七 0 年代忏情录》，杨泽编。台北：时报出版社，1994 年。  
[Xie Caijun. “Zuo Ri de Xue Er Jin He Zai?” *The Confessions in the 1970s*. Ed. Yang Ze. Taipei: Tim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胡兰成：“文明的传统”，上海：《苦竹》2（1944 年 11 月）：173-180。  
[Hu Lancheng. “Tradition of Civilization”, Shanghai: Bitter Bamboo(Nov. 1944. No.2. 173-180)  
——：《今生今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 年。  
[— *Jin Sheng Jin Shi*. Hong Kong: Tian Di Book Co., Ltd. 2013.]  
——：“来写朱天文”，《中国文学史话》。台北：远流，1991 年。95、268、283。  
[— “Come and write Zhu Tianwe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Yuan Liu Press, 1991. 95, 268, 283.]  
——（李磐）：“音乐论 10”，《三三集刊》第 24 辑。台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36-47。  
[— (Li Pan). “On Music 10.” *San San Ji Kan* (Volume 24), Taipei: Crown Press, 1979. 36-47.]  
——：“张爱玲与左派（1945）”，《乱世文坛》。香港：天地图书，2007 年，第 31 页。  
[— “Eileen Chang and the Left (1945),” *Chaotic Literature*. Hong Kong: Sky Map Book, 2007. 31.]  
马叔礼等编：《三三集刊》第 7 辑。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 年。  
[*San San Ji Kan*(Volumes 7), Taipei: Crown Publishing House, 1977.]  
马叔礼等编：《三三集刊》第 9、10、11、12、13、14 辑。台北：皇冠杂志社，1978 年。  
[*San San San Ji Kan* (Volumes 9, 10, 11, 12, 13 and 14). Taipei: Crown Magazine, 1978.]

马叔礼等编：《三三集刊》第 24、25 辑。台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

[*San San San Ji Kan* (Volumes 24, 25). Taipei: Crown Press, 1979.]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Wang Dewei: “The wheat that falls to the ground will not die — Eileen Chang’s literary influence and the way of surpassing the writers of Zhang School.” *Method of Imagining China: History, Novels, Narration*. Beijing: San Lian Bookstore, 1998.]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

[—, *Lyr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 Eight Lessons 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San Lian Bookstore, 2010.]

仙枝：“序”，《中国文学史话》，李磐（胡兰成）著。台北：三三书坊，1980 年，第 3-4 页。

[Xianzhi. Preface, *Historical Tal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San San Bookstore, 1980. 3-4.]

杨泽：《七十年代理想继续燃烧》。台北：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4 年。

[Yang Ze. *Ideals continue to burn in the 1970s*. Taipei: Taiwan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朱天文：“编辑报告”，《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著。台北：远流，1991 年，第 2-3 页。

[Zhu Tian. Editorial Repor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Hu Lancheng. Taipei: Far Current, 1991. 2-3.]

——：“如何与张爱玲划清界限”，《中国时报》（1994 年 7 月 17 日），第 7 版。

[—, “How to draw a clear line with Eileen Chang.” *China Times* (July 17, 1994), 7th Page.]

——：“花忆前身——回忆张爱玲与胡兰成”，《再读张爱玲》，刘绍铭等著。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年。311-318。

[—, “Flowers recall their predecessors - recalling Eileen Chang and Hu Lancheng.” *Read Eileen Chang again*, Ed. Liu Shaoming and others. Jinan: Shandong Hua Bao Publishing House, 2004. 311-318.]

张诵圣：《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法则到市场规律》。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Zhang Chansheng. *Taiwan Literary Ecology: From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Zhenjiang: Jiangsu UP, 2016.]

庄宜文：“朱西宁与胡兰成、张爱玲的文学因缘”，《纪念朱西宁先生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王德威等著。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 年，第 144—46 页。

[Zhuang Yiwen. “The Literary Reasons of Zhu Xining, Hu Lancheng and Zhang Ailing.” *Collection of Workshop Papers in Memory of Mr. Zhu Xining*. Ed. Wang Dewei. Taipei: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2003. 144 - 46.]